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8月11日

理论研究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自觉”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类已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今天的全球化已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全球化，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理论界经常使用的“文化全球化”，尽管在理解上存在分歧，但一般而言，主要是用来描述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彼此融合的过程。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必须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对这一重要问题，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重从学术学理上加以分析。

从经济全球化到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并不仅仅发生并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扩展并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人类的文化发展进程和人类文明格局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生产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显而易见，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带动并实际地推进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世界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村”。

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众所周知，“文化自觉”是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并阐发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用以表达生活在特定历史文化圈子的人要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知道其文化的“来龙去脉”。在此，我们借用这一概念主要表达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文化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中心和焦点，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汤姆林森曾敏锐地指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文化是民族之魂，人民的精神家园，任何国家、社会，没有文化是建设、发展不起来的。在这方面，曾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韩国顺势提出的“文化立国”发展战略，就是典型的成功案例。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一种色彩、一个色调，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的单一化、同质化。实际上，正如罗伯森提请我们注意的那样，“全球资本主义既促进文化同质性，又促进文化的异质性，而且既受到文化同质性的制约，又受到文化异质性制约”。可见，文化全球化理应是一个同质性与异质性、全球性与地方性（民族性）这些相反相成的元素良性循环、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学习大国，应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学习发达国家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另一方面，文化已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相互交锋的舞台，文化竞争、文化渗透、文化依附问题也日益突出。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进程中，由资本主义率先开启的全球扩张必将造成这样一种“所谓文明制度”。“正像它（资产阶级）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显然，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东方与西方在文化发展中是极不平衡的。于是，在东方与西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中，最终在近现代形成了“强——弱”“中心——外围”这样一种基本的文化发展格局。时至今日，“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也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渐加速，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文化交融更加深入、文化交锋更加激烈。无疑，文化领域的对话、沟通、合作在国际交往中已经显现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由于文化发展中现实的不平衡性、不对等性，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和侵蚀在所难免，这也已成为民族文化交往中的世界性难题。

从“武器的批判”到“批判的武器”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自觉”要求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正处在一个从“武器的批判”走向“非武器的批判”或“批判的武器”的新时代。马克思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权力的转移》中，托夫勒更加明确地宣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制作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在这里，托夫勒明确使用了“文化征服”这一概念。的确，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强势文化正是通过语言、信息、网络等媒介对外推行或输出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关于这一点，美国政府毫不隐讳地宣称：“美国应该确保……世界正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今天，如果说大规模的“武器的批判”已暂告一段落，那么，我们正面临的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热战”，“批判的武器”才刚刚出场、方兴未艾。谈起战争，人们头脑中首先浮现出的就是血肉飞溅、炮火连绵、硝烟四起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但总体上看，较之于短兵相接、刀光剑影的军事“冷战”和“武器的批判”，文化“热战”“批判的武器”的形式和内容都更加多样化且更具隐蔽性，它并不单单体现在文化领域和文化活动之中，而且贯穿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贸易等一切可能涉外领域和活动之中。用曾负责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魏德曼的话说，就是文化渗透，这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从根本上而言，“武器的批判”属于“硬”批判，“批判的武器”则属于“软”批判。但须知，较之前者，文化侵蚀“比军事侵略狠毒得多”（瞿秋白语）。打个比方，如果说“武器的批判”是充满血腥、炮火的“明战”，那么，“批判的武器”则是没有硝烟的“暗战”，这是一场争取人们心灵和头脑的“斗争”，旨在从根本上动摇对手的信念、击碎自信、分化共识、消磨斗志、离间情感，从根基处瓦解精神支柱、扰乱人心所向，摧毁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

事实上，自“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思潮不断泛起。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这不是反应过度，也并非危言耸听。单从美国对华的“三步走”和“十条诫令”中，就可以窥斑知豹。因此，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应该保持警觉、警惕和理性的分析、判断。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之路径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可以说是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且大有深意。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应当而且必须积极作为，切实增强“文化自觉”。

首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大战略不动摇。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文化生活和文化影响力的根子和基础首在经济，抵御文化渗透首先必须筑牢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应当看到，经济实力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是掌握文化话语权、领导权的最有力的支撑，是无声的话语权。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强势文化之所以“强”且拥有话语权，是以其背后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为支撑的，弱势文化之所以“弱”，也与其落后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直接相关。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都离不开发展”。发展依然是硬道理，是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掌握话语权的法宝。



其次，倡导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文化从来都是在对话、交流、碰撞、融合中不断向前发展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罗素曾十分中肯地指出：“在往昔，不同文化的接触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也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庭学习。在那些情形之下，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我们深知，文化交锋中有融合、文化竞争中有合作；同时，文化对话、交流中也有文化渗透甚至文化侵蚀。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人为阻断文化间自由平等的对话与交流的通道。须知，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可取的。当代中国应该成为各种文化之间自由平等对话与交流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倡导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就必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因为多样性的存在而使得文化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由此可见，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是值得大力倡导的。由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必须积极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学会学习并欣赏异质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最后，在传统文化的自觉中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还要靠文化本身的发展来解决。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提升文化软实力，关键在于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套用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来说，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民族和社会，就犹如一个装潢得富丽堂皇的庙堂缺少一个至圣的神一样，是没有精神和灵魂的。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文化之髓，犹如名山之“仙”、灵水之“龙”一样，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杜维明先生曾指出：“如果你对传统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所引进的价值也只会是肤浅的。假如你对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对它的阴暗面进行了长期的批判，同时对它的智慧进行一种开发、一种沉积，那么你对西方价值就有更深刻的比较，对西方价值所带来的阴暗面也可以有更彻底的了解。”实际上，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就必须克服“历史归零”（没有历史记忆）和“历史碎片”（用局部历史消解整体历史）的历史观，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正如汤因比所言：“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的确，积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必将大大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持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也应该坚定这样的文化自信。

（执笔人：王虎学）

党的思想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行

编者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作者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流行置于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侧重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社会主义在中国流行之间的关系。

□卢　毅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但长期以来，人们在论及这一点时，往往仅归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忽略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十月革命本身也是以一战为契机并在此期间爆发的。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更是与刚结束不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

1914—1918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有余，伤亡人数3000多万，耗费达3599亿美元，约等于战前各交战国财富总和的一半。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将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在战后的欧洲，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严峻的失业形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革命运动时有发生。英国经济学家沙德卫尔便说：“大战后欧洲的工业生活可以说是纠纷多极的，没有一国没有罢工和闭厂的事情。其甚者——例如西班牙——则竟至于双方互相残杀而现出恐怖的景象。”总之，战后的欧洲一片萧条，如处风雨飘摇之中。

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洲人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笼罩在一片悲观、彷徨和迷惘的气氛之中。美国学者艾恺即曾描述说：“就20世纪10年代、20年代及30年代的时代而言，大战是主宰他们时代的压倒性重大灾变，大战产生的对西方文化之未来的黯淡悲观与深切疑虑是极为强烈和普遍的。”而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则风起云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被视为能挽救欧洲的良药。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指出：“最重要的便是现在有一大国居然已把社会主义实施起来了。从前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理论，寻常人都当作不可即的一种幻境。现在过激派的设施，为功为罪且不去管他，但至少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是适合于大国家的。”法国文学家佛郎西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社会主义的形式，世界各处虽然不免互异，但是要希望挽救欧洲，却只有这一个法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样也是十分深刻的。据统计，从1914年欧战爆发到1919年巴黎和会，《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等著名报刊皆以大量篇幅报道和评论欧战，至少占其版面1/3。从这些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动向，那就是一战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西方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

西方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曾一度被视为近代文明的故乡，自由平等博爱的乐土，但一战的熊熊烈焰却烧毁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含情脉脉的面纱。早在1916年一战正酣之时，《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就说：“近年以来，吾国人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致，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稍后，他又指出：“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此非吾人偏见之言，凡研究现代文明者，殆无不有如是之感想。”因此，“信赖西洋文明，欲借之以免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继其之后，梁启超也发表了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省。他在《游欧心影录》一书中为国人描绘了战后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并宣告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而周恩来1920年赴欧留学之初，便在为天津《益世报》撰写的第一篇旅欧通信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方知昔日之理想乃等诸梦呓。”他因此质问：“然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他们心目中逐渐失却了原来那种耀眼的光芒。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风起云涌

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因受一战影响而产生的另一动向是，社会主义思潮受到了热烈欢迎。早在20世纪初，中国便已有人撰文介绍社会主义，但一直未能形成一股热潮。而随着资本主义文明梦的破灭，国人则普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端，是一贴对症的良药”。陈独秀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当时还有人表示，“社会主义为救现代社会一切恶弊的万能药。恐怕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良心上也是承认的”，甚至说，“各文明国在这五六十年之内，次第变为社会主义化的国家，决非难事”。1923年4月13日，中国大学曾经在建校十周年纪念日举行一次公民常识测验。其中一项是“你欢迎资本主义吗”，结果是不欢迎者1991票，占73%；另有一项“你赞成社会主义吗”，表示赞成者2096票，占76%。无独有偶，同年12月17日，北大在25周年纪念日也开展一次民意测验，其中问道：“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最终社会主义得291票，资本主义得4票。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喜恶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在巴黎和会上蒙受了屈辱的外交失败，这就更使中国人彻底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放弃了对它们的幻想。李大钊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人们当时这种心情：“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和平）取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色彩）了。谁知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和平）、光明的影子！那（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在经历这一惨痛教训后，原先一直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抱有好感的陈独秀也清醒认识到：“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因此转向宣传社会主义，并疾声呐喊：“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而瞿秋白更是一语道破社会主义思潮高涨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与此同时，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苏俄政府却先后两次发表了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在中国获得的一切特权和密约，并热情呼吁：“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这在中国各阶层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极大引发了人们对苏俄社会主义的好感和兴趣。上海《民国日报》就发表评论说：“这一次俄国劳农政府对中国国民的通告，自传到上海以来，中国人民心理上起了一个极大的震动。这几天以来，各团体对于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都有极诚恳而有力的表示。”全国各界联合会也致电苏俄政府表示：“中国人民除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外，皆愿与俄国人民携手。”1923年的那次北大民意测验还提问“俄国与美国，谁是中国之友？”，结果选择以俄国为友者497票，以美国为友者107票；另问“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最终世界大人物以列宁居首位，得227票，而美国总统威尔逊仅得51票。以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孰轻孰重，显然不言自明。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国人逐渐摆脱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心理，从而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人即曾描述：“譬如社会主义，近来似觉成了一种口头禅；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当时还有人如此写道：“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一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的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这无疑意味着一战后的中国思想界已超越以往，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链接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欧洲的衰弱分裂和美日的兴起，世界格局发生改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诞生了苏维埃俄国；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如中国五四运动，巴尔干地区、原奥斯曼帝国辖境、奥匈帝国辖境新兴的民族国家）；导致了四大帝国的崩塌。